

寻找香格里拉

沈卫荣 著

In Search of

*Essays on China Studies,
Philology and Virtual Tibe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下文丛

寻找香格里拉

沈卫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香格里拉/沈卫荣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天下文丛)

ISBN 978-7-300-12814-6

I. ①寻…

II. ①沈…

III. ①西藏-地方史-文集 ②喇嘛教-文集

IV. ①K297.5-53 ②B94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100 号

天下文丛

寻找香格里拉

沈卫荣 著

Xunzhao Xianggelil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 mm × 21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4.75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7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从元代出发，从语文学出发（代序）

马丽华

前不久有两篇西藏话题的署名文章在网上热传，一篇《谁是达赖喇嘛？》，另一篇《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作者沈卫荣。二文显见是做足了功课，让读者不由不眼一亮、心一动，感觉得到视野被开阔，见识被刷新，于是有人惊奇，“谁是沈卫荣？”

其实在我们藏学界，其人早已是“闻人”，时下或可称“达人”，好长一个时段内且还曾是一位“海外达人”。从问学到学问，是他的基本姿态：三十年前的少年沈卫荣，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十年国内寒窗苦读，追随蒙元史大家陈得芝先生治元朝历史；期间复师从藏学大家王尧先生，步入西藏学，开始发表一系列有关元代西藏历史研究的优秀论文；继之是为时甚久的海外游学，西欧美，东扶桑，由中亚学和比较宗教学起步，后来的工作包括在德国、美国、日本、尼泊尔诸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也包括为外国学生讲授古藏文，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步步为营。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游方列国，历练成长，甘苦自知，只是初衷不改，始终以西藏历史、宗教研究为矢志不渝的事业，努力在国际藏学界为中国学者争得更多话语权。沈教授此前的海外生涯犹似隐居闭修，回归即出山，以致未见滑翔，就见高飞。难怪网友读者惊奇，不知何方神圣下凡。事实上，这类普及文章只不过是厚积薄发、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吧！

就这样，当沈卫荣教授以汉、藏文以外的德、英、日语和梵文武装了语

库，脑海中充满国际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和问题——他就这样盛装披挂归来，受聘于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当即投身于蓬勃发展、但也一度引起过争议的相关国学的讨论和建设。他以在国学院主持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两个学术机构，躬行“大国学”理念。短短五年时间里，他和同事们一起，联合国内外各路专家，带领一批本科生和硕、博士生，学习梵文、藏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回鹘文等西域语文，积极倡导并从事西域历史、语文、宗教和文化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就在今年，2010年夏天，国学院首届毕业生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中西域学、藏学专业尤为媒体所关注。就此可否说明，从学术到理念，沈教授领衔主持的这两个新学科的建立和建设都极大地充实了人大国学院，也将人大国学院师生倡导的大国学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我和沈教授初识于五年前，他刚从海外归来时。说是初识，却全无陌生感，就像是认识了一辈子。尤其让我这个全无师承、一向自行其是的江湖大姐心头一喜的是，这位学院派藏学家对于草根派拙著的肯定。这位有心人从《藏北游历》最早的版本开始，从海内海外的这里那里，陆续集齐了《走过西藏》系列，从西藏的北部、西部、中部，直到藏东红山脉，一路跟进，一起追逐西藏“像风一样的灵魂”。据称从中领略到了他当时未能亲见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印证了他过去只在课堂和书本中学到的西藏知识，体察到探求汉藏两种文化之异同和寻求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互动之途径，彼此间相通的一番苦心，包括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喜悦与困扰——不好意思，多有溢美之词——反映在《我读马丽华》一文，也收入本集中。草班子野路子也能为学院派的庙堂所接纳，有沈教授这样高水准的学者的认可，无疑是不小的鼓励。

沈教授归国不久，即被聘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一步到位地进入国内藏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学术指导机构；随之兼职受聘为我们中国藏学出版社的英文总编，因而我们一经结识便交往热络，不时共议藏学界大事，商量如何出版更多藏学精品。沈教授早年曾在我社出版过译作《西藏的贵族和政府》，二十年前我就曾拜读过。该译作对他来说，不过是初出茅庐者的小试身手，但起点却不低。近年来他又主编了一套“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将一部又一部有

质量的学术著作交给我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达成了我社开展多语种图书出版的多年心愿。这些都是属于工作层面的联系。至于个人交往，则是典型的以文会友：各自每完成一篇新作，便从邮箱寄发，先读为快的同时，相互评点。当然，这常常是并不太对等的交流——在我，更多请教式探讨，体会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作为学者的沈卫荣，不仅是人大一位知名教授，即使在国内和国际藏学界也卓有影响。他的学问或许可用藏传佛教文献中常用的两个词汇——甚深和广大——来形容，其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反映在他数量不少，且用中、英、德、日等多种文字发表的藏学专业论著之中。据我所知，他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一世达赖喇嘛根顿珠巴班藏波（1391—1474）的生平和历史意义：格鲁派和达赖喇嘛制度史研究》，被认为是国际藏学界研究格鲁派早期政治、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列之形成的经典之作；另一专著《〈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及研究》，则于汉藏佛教研究之间的重新沟通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我读过的学术论文中，有两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篇是2005年发表在台湾《新史学》杂志上的《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另一篇是2009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前者正本清源，拨开藏文古文献中的重重迷雾，重新诠释汉藏佛教历史上的“吐蕃僧诤”事件，后者高屋建瓴，以国际学术前沿的视野，为建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这门新学科勾画了蓝图。这样的评判并非过誉，传统的藏学研究因之注入新元素。若用“学贯中西”来褒奖，沈教授必定不自在。这位谦逊的学人保持着永远的学生姿态，因为学海无涯。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小小失学，至今对中学一知半解；游学西方虽十又六年，可对西学的认知尚不及对中学之一知半解”；他所做的不过是“有心步前贤后尘，勉强作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罢了。学然后知不足，书到用时方恨少，相信这番夫子自况不仅仅是自谦。

在从事教学、科研之余，近年来沈教授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随笔类的作品，本文开头提到的两篇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之作。从看似非主流的领域入门，从少有同行者的偏僻之路出发，跨越古今中西的门槛，在学术建树的同时，偶

尔小试笔锋，发表一些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并从中受益的随笔，由此得到读者的认同和赞扬，值得称道。相比较而言，我并不认为这本随笔集足够代表作者的最好水平，可以与他的论文集并驾齐驱。进一步说来，即使达到了目前的最好水平也不希望就此结“茧”，我们有理由心存高级期待。为此建议有意对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作深度了解的读者，不妨将这本随笔集与沈教授的学术论文集《西藏历史和宗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结合起来一并参看，那里有多篇涉及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研究的文章很有意思，对于一般受众而言也具适读性。由于学术和大众的分野，更为避免重复编选，而未能收入本集中。

从其人到其文，通篇看来，我以为收编于本书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认知的纠偏，二为学识的传播，三为心迹的表明。这三者常常互为表里，既专题亦综合，略作区分只为在此表述方便。尤其对于“纠偏”，纯系本人从阅读感受中归纳而来，作者并非刻意为之，不过是说事明理，把我们不以为问题的问题作为问题提出，从而引起注意和反省。例如，元明之际自中原士人开始滥觞的对于藏传佛教，尤其对于密教传统的误读，妖魔化+色情化，以偏见作定见，代相传递，直至当下，集中反映在二十多年前的某组小说中，发表后一度引发风波，并且差一点儿酿成危及民族关系的灾难性事件。沈教授告知我们，那种偏见是错的，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应当是怎么回事。当然，另一方面，例如西藏佛教史上被创造出来的传统中，对于汉传佛教尤其禅宗的认识和态度同样有“偏”可纠，若干篇意在匡正的探讨文章已收纳在他的学术论文集里。

如果说这还是仅就具体事物而言，那么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例如重新审视国学概念，是不是具备了相当的发言权。《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等几篇文章涉及了这一话题，旨在更新国学≈汉学≈儒学≈四书五经的传统认识，这也是从事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同声表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经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广义国学理应涵括各兄弟民族文化。实际上，沈教授不仅为此鼓与呼，也正好有条件起而行。如前所述，人大国学院名下设立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两个学术机构，已成实践大国学理念的教

学基地。

学识的传播，某些重申的常识不妨当做新知来读，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面对做学问的学问，即方法论方面的，如语文学，可能会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将之视同于训诂学一类，非大学而小术，但当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说不定就会改变看法：“译注一世达赖喇嘛的两部传记时，我并没有奢望要重构15世纪西藏政治和宗教的历史。当我完成了译注之后，我却惊喜地发现这样一部历史已跃然纸上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一些，如此日积月累，学问扎实厚重了，豁然别有洞天，应是题中之意。

另有关于“背景书”概念的引进，更是有益的提醒。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的未知地区，却很难走出你母体文化已然构筑的樊篱；你所见闻的，往往是迎合期待的，或者是，印证了你所预设的真实。即使足不出户，依然面向大千世界，“背景书”何尝不在时时地左右着我们的识见和言行。当然，抛开文化背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是当我们试图寻求真相真理，从而达至理解宽容，或者决定是否坚守，每当这时候，警醒到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盲目乃至谬误。

至于心迹表露，其实充满字里行间，有一篇最为直接：《我的心在哪里？》，自问自答，具体定位在语文学，潜心做学问：“一位热爱学问、文献和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家，平生最大的野心不过是要厘定、读懂和解释传到我手中的文本。”是夫子自道，也可视为群体宣言，从中显现一个动态的链接和延伸——承接近现代以来自王国维、陈寅恪、季羨林等一代宗师和以韩儒林先生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并且完成代际传播：今天在沈教授和他的同事乌云毕力格教授指导下的年轻后生们，兼修多民族语文，训练有素，学有专攻，对于非汉文文献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使用了抽丝剥茧式的语文学方法；同属国粹国故的多文种文献资源，或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被开发，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学内涵有望就此丰富起来。

一方面是冷学问，一方面是热话题，沈教授参与了讨论，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另一优良传统：书生报国，心在民族大义。从西北舆地之学发蒙到当今边疆史地研究，百余年来所贯穿、所充溢的，正是最为深切、痛切、热切的爱国

情怀，这一心迹无须说明，不言而喻。网上热议的、读者欣赏的，正是这类非同一般的工夫文章，诸如《谁是达赖喇嘛？》——几百年历史一路看过，是体系和概念，符号和象征，说复杂也简单，他不是哪一个谁，这个复数的他只是被规定、被引申，尤其当下更多地被“政治”了。近年来总称为“西藏问题”的一系列国际化了的争讼居多为伪命题，作为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语文学家，他把纯粹的学术看做安身立命之本，志业既不在热闹处，私下里甚至为写这些“小文章”而感羞涩，所以沈教授的热点发言有可能只是偶一为之，惊鸿一瞥。作为读者，遗憾的同时表示理解。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借用藏式形容词言说，被理性知性光芒照亮的学者散文，那是嘉言宝库、智者喜宴、松石宝串、金色麦穗，是甘露精华、吉祥雨降、霹雳之钥、孟夏雷声……看到这组比喻沈教授定然会心一笑，因为它们正是他所熟知的古今藏文经典的书名或副标题，这类藻词的使用也正好反映出藏文书写者对于世界别样的感知和表达，以及对于知识的格外珍视与热爱。

来自藏汉各民族本土学识的培育，加上欧风美雨的灌溉，成就了沈卫荣其人，由此也惠及了一众学生和读者。在我，虽然虚长多年，但从亦师亦友的沈教授那里获益良多。试举一例：拙著《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完稿后，特请沈师审看，订正了多处史实，其中最重要的提示，是将唐蕃时期的法成法师单列一节。这位法成法师在敦煌，终其一生致力于佛经翻译：将梵文译成藏文和汉文，或者藏汉文互译，于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和贡献厥功至伟。陈寅恪先生曾将法成与玄奘相提并论，被誉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国人对其事迹知之不多，中外藏学界甚至对于这位大师的族属是藏是汉迄无定论。对于其人其事，一经提点，赶紧补写一节，果成点睛之笔，全书亮点。沈教授并应请作序——当下遵嘱为本书写序，有推托不掉的原因，此即因果，同时体会到什么叫“现世现报”。

是序言亦絮言。行文至此，从千几百年前的法成法师，不期然地联想到我们的沈教授，同样的精通藏汉文，同样的在从事着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只是时代有所不同，内容更其丰富。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文化担当，薪继火传，生生不

息；进一步联想到首创了“托命”之说的前辈大师，联想到沈教授同时代的这一群学术精英，看起来冥冥中已被赋予了使命。这样的联想让我感动。

2010年9月20日于北京

2010年10月20日改定

目 录

初识冯其庸先生 / 1	
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 / 5	
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 14	
我的心在哪里? / 29	
说学术偶像崇拜和学术进步 / 41	
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佛教研究 / 55	
大喜乐崇拜和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 / 69	
《欲经》: 从世间的男女喜乐到出世的精神解放 / 87	
寻找香格里拉	
——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 106	
说跨文化误读 / 124	
谁是达赖喇嘛? / 150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 162	
我读马丽华 / 178	
“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 190	
说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 199	
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 / 212	
后记 / 224	

初识冯其庸先生

2005年10月，我意外地收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来信，说是奉冯其庸先生之请，邀我加盟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与冯先生素昧平生，只知道他是红学大家和兼擅诗、书、画的大师。人大礼请冯先生出任国学院院长实乃众望所归，但他何以要招我回国在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带着很多的疑问，我很快从东瀛飞回北京，随即赶往京郊通州芳草园，拜会瓜饭楼主冯其庸先生。

一见到冯先生我就感到分外的亲切，意想中的硕儒、乡贤原来更像是一位慈祥的邻家大爷，一口浓重的乡音顷刻间让我找回了在十六年海外漂泊中早已失落了的根。其实，我的老家离钱穆的故土不过三五里地，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斯文。而冯师母竟然和我一样来自甘露——一个曾以出产酱油而小有名气的江南小镇，这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故乡有了几分自豪。江南古来多出才子，但这早已经成为不可再现的神话。如今大概也只有瓜饭楼中才能领略当年江南文化的余韵，也只有冯先生身上才能体会到江南才子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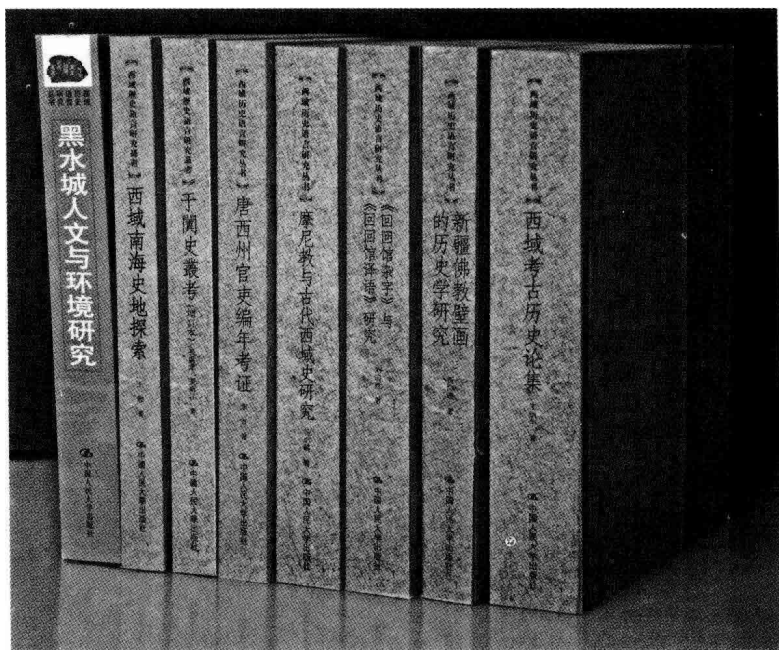
瓜饭楼从外表看挺像江南农家小楼，但其内在却凸现出今天的江南已经很难见到的文化气息。院子里耸立着的两块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巨大的太湖石，一袭紫藤挂在石头背后，周遭疏疏朗朗有几枝世上罕见的古梅，自然凑成一幅国画图样。瓜饭楼内到处是罐、瓦、碑、像，冯先生一一介绍，这是秦砖、汉瓦、魏碑，那是唐代的石雕、明代的铜像，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件件货真价实，

但冯先生对它们的热爱却让我看得真真切切。瓜饭楼中楼上楼下到处都是书，冯先生坐拥书城，他的藏书可以抵得上一家图书馆了。在他的藏书中，我看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这正是我当时所作研究的重头文献，冯先生竟然有全套收藏。在日本最让我羡慕的是日本教授坐在堆满好书的办公室中那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而冯先生的藏书恐怕连曾经非常富裕、且酷爱藏书的日本教授们见了也会艳羡不已的。

瓜饭楼很多房间的墙上都挂着冯先生自己的和冯先生师友们题赠给他的书画作品，一路参观过来就像是观赏了世上难得一见的中国传统书画精品展览。在冯先生工作室宽大的写字桌上，我还见到了一幅新书墨宝，墨迹未干，显然是冯先生刚刚手书完成的新诗作。说实话，兼擅诗书、能吟善画、有冯先生这等造诣的学人，此前我还真没见到过。此刻有缘亲见，除了对眼前这位硕果仅存的江南才子由衷敬仰之外，同时也对这种几乎完全失却了的中国文人传统生出无尽的缅怀之情。

冯先生那天和我谈的主要是他与西域的情缘，谈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十余次去西域考察的经历，还展示了他在西域创作的书画和摄影作品。冯先生曾多次沿着玄奘法师当年走过的道路，实地考察《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那些名胜古迹，对东西文明于此交融之盛况有切身的体会。就在此前不久，冯先生复以八十三岁之高龄，带领国内一千西域研究之新进，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丝路考察。他和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于罗布泊中，还踏入大漠深处，勘察楼兰古城，探寻玄奘当年留下的足迹，斩获甚丰。一位耄耋之年的江南才子竟然依旧如此钟情于广漠的西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丝绸古道，这难道不足以令世人从此对我们江南人刮目相看吗？

冯先生还谈起了他当时正在撰写的关于项羽自刎乌江之确切地点的考证文章，根据的不只是相关的古文献资料，其中也有他多次实地考察的心得。他还谈起了当年他和钱仲联先生一起几次实地考察，最终发现、确定吴梅村墓的往事。冯先生说这些事的目的是，大概是要告诉我“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同样重要。我心想冯先生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不正是他毕生躬行这条古训的结果吗？！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书影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书影

最后，我们谈到了正题：何以要在人大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冯先生说：人大创办国学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但也有一些误解，以为我们要尊孔复古。实际上，我们办国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我们主张的国学不是狭隘的汉学，而是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我们不只是要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我们还要研究其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传统。西域文化荟集中西文明之精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重兴国学，当然也应该重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不幸的是，虽然中国学人念念不忘上个世纪初西域文献和物质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劫掠的那段“学术伤心史”，但我们对西域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至今却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许多领域已成“绝学”。所以，我们要在国学院建立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认真培养好下一代青年学生，继承绝学，并把西域文化当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来发扬、光大。

先生寥寥数语于我如醍醐灌顶，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在海外不过是自谋稻粱的工具，和个人的人生追求关系不大。而追随冯先生，倡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弘扬大国学理念，于我无疑是可将事业和人生完美结合的上佳选择。于是，我决定从此结束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漂泊，踏上海归之途。

原载《文景》，2010（6）

闲话国学与西域研究

于海外游学十六年后，下决心回国就职。日前媒体采访，让我谈自己的学历和对国学以及我从事的西域研究的看法。本来人微言轻，且还不到要回顾的年纪，但被人突然于这个特殊的时刻问起，禁不住想一吐为快。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中哪一件事对你的学术选择有重大意义？我想与我同时代的学人或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对专业的选择并非一开始就与个人爱好有关。当年我上历史系就只因各科考分中历史最高。大学毕业考研时决定报考蒙元史专业，亦不是因为当时对这个专业已有充分的认识和爱好，而是因为当时南京大学的蒙元史研究全国一流，导师韩儒林先生是当时系内最权威的学者。但我并没有成为韩先生的弟子，获告被录取之后为元史研究室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校园内张贴韩先生的讣告。我的导师是陈得芝先生，在他指导下我在南大元史室学习、工作了将近七个年头。回想起来，当年在南大读本科时，许多青春时光是白白流逝的。尽管有很高的学习热情和无穷的精力，可没有人告诉我课外应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所以大学四年并没有为下一步的专业训练作好充分的准备。两年前一一位从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海龟”的老同学对我说，他回国服务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学校太重研究生培养，而不重视本科生教学，老师们对不住优秀的本科生。我听后内心为之震颤，亦对这位据称孜孜不倦于本科生教学的老同学产生由衷的敬意。

我在南大读研究生的经历对我以后所走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尽管我并没

有完全留在本专业内。蒙元史研究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界一个很特殊的领域。该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中人才济济。在海外闯荡十六年之后，我依然觉得蔡美彪、亦邻真、陈得芝等蒙元史学者绝对世界一流。海外学术同行见过不少，但从未见到过一位才情、学问可与亦邻真先生媲美的学者。作为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专门史，蒙元史研究十分强调学习外语和吸收海外学术成果。记得韩儒林先生曾在迎新致辞时说：学习历史要有两根拐杖，一根是古汉语，一根是外语，离开这两根拐杖就没法走路。十余年前读到刘再复先生在海外写的一篇题为《身无彩凤双飞翼》的小文章，主题是说：人做学问须具中学、西学双翼，他那一代学人没有这副翅膀，飞不起来；其中人品好的勉强能走路，人品次的则做小爬虫。刘先生的“双翼说”和韩先生的“两根拐杖说”异曲同工，然当时的学者中有这种危机意识者不在多数。而韩先生的“两根拐杖说”于蒙元史学者中却影响不小。两年前在京都龙谷大学听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先生演讲，会后闲聊起他们这一代治中国古代史学者们的外语能力。王先生脱口而出，说除了张广达和陈得芝，其他都不行。可见当时真拿得起外语这根拐杖者真是凤毛麟角。事实上，于治蒙元史或治“西北舆地之学”的学者中间，外语能力强的不只是张、陈二位先生，于我熟悉的学者中间就还有亦邻真先生、邓锐龄先生等，他们都是精通好几门外语的优秀学者。

我在南大元史研究室头一年的经历，至今想来依然冷汗三斗。与同学相比，我的学习条件得天独厚。元史室有自己的资料室，有关蒙元史的中外文资料应有尽有。老师、师兄们每天来室内读书、讨论，合作著书，并主办自己的学术刊物，充满着蒸蒸日上的气氛。这让我大长了见识，亦自觉应该像老师和师兄们一样奋发有为。但这样优越的环境和气氛亦烘托出了我的无知。前辈的成就高不可攀，好像不曾留给我等后生可待发掘的空白。想做任何一个题目总有名家名篇在前拦路，又牵涉众多不同语言的资料和论著，令人力不从心。一年间翻翻古籍，读读洋文，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何时能找到一个前人未曾太多留意而自己又有能力研究的题目。可幸陈老师很快看出了我的惶恐，给我指了一条可在蒙元史学界独辟蹊径的生路。元代的蒙藏关系曾是蒙元史领域内一个尚待发掘的题目，藏文文献中有许多有关蒙元历史的资料。韩先生留学欧洲时